

生态现代化建设:时代背景、制约因素与推进策略

张亚茹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校刊部,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生态环境治理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发展理念以来,中国已经在多元层面上数次提到建设生态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问题。总体看来,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挑战是中国推动生态现代化的主要动因。当前,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尚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生态问题在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将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逐步扩大生态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和文化传播、建立常态化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行政文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绿色科技的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环境治理;国家治理能力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1.03.005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1)03-030-06

作为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现实意义的会议,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联系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状况,持续推进生态现代化,加快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生态条件的改善对于2035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意义重大。

一、中国推动生态现代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生态现代化概念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马丁·耶内克提出。他在《作为生态现代化和机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报告中明确指出:“现代化工业特征,而非资本主义特征或者官僚主义特征,才是生态现代化的逻辑起点。”^[1]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并非单纯的“生态环境现代化”和“生态治理现代化”,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工业发展诉求的“生态经济现代化”和“生态可持续现代化”。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新模式以来,中国已经在多元层面上数次提到建设“生态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总体看来,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挑战是中国推动生态现代化的主要动因。

(一)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是中国推动生态现代化战略的初始动因

文化人类学认为,一切意识形态、思想学说、伦理变迁和科学技术以人类生存为有效存在的生物学为基础。当人类运用“机巧”(科学技术)“征服”“外在自然”(通常意义上的外部自然环境)和“内在自然”(通常意义上的人类生理环境),并使之符合人类的意愿时,潜移默化的“毁灭性趋势”也随之而来。这种“生态灾难”可能表现为霍布斯“利维坦式”的政治负外部性、达尔文自我选择机制的残酷性后果,又或者表现为“普力夺”式的利益竞争潜规则、人性堕落的道德破坏性外溢,这些最终都将危及人类社会,使人类“肢体”加速支离破碎。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费·卡普拉所说:“当前的危机不是个人的危机、政府的危机、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环境生存危机。无论是作为生态节点的个人还是作为自组织的社会抑或是作为行政管理的软文化都处于人类历史的拐点上。”^[2]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与生态文化变迁密不可分的次生灾害问题,是一种生态问题。只有在生态法则的启示下,从人与自然的有机互联、共生共存的角度系统审视经济理念、行政思想、法治思维、文化变迁、军事哲学等要素,才能还自然以公平与正义,才能促进国家管理机制的深化改革和公共治理效率的快速提升。

[投稿日期]2021-09-04

[基金项目]山东省软科学课题(编号:2020RKB01061)

[作者简介]张亚茹(1974-),女,陕西西安人,副编审,硕士,研究方向:社会治理。

(二) 可持续发展观的挑战是中国推动生态现代化战略的重要因素

萨拜因说过:“现代文明的进步都与政治场域的博弈和争夺有关,在观念正向演化的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正在遇到行政权力‘暴力’取向的极大挑战。”^[3]尽管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都在极力阻止因土地决策不当引发的沙漠化问题、因农产品开发规划不当引发的转基因食品污染问题、因卫生管理失当引发的传染病问题、因工业化治理“黑箱操作”引发的“越治理越污染”的问题、遍布城乡的三废排放严重超标的问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温室效应”问题、借治理腐败为名进行的“生态环境决策性腐败”问题、为缓释腐败收益而滋生的畸形“消费”问题等,但都没有触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博弈困局问题。就世界变迁的总体趋势来说,外在自然和人类欲望之间的矛盾只是宇宙演化过程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这种对立不仅预示着人类生存质量和物种数量的下降而且内在决定着人化自然的畸变程度和发展趋势。换句话说,遍布行政场域的各种物质欲望、权力欲望、支配欲望、异化消费欲望、刺激性生理欲望、权威欲望、能力欲望是造成环境畸变的初始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不优化,人类社会的生态衔接机制就永远建立不起来,经济发展和自然之间的生态关联就会流于笑谈。而生态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就集中在政治环境现代化、国家新型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微观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消费文化现代化、社会生态决策民主化、多元生态文化现代化、生态行政现代化和国际生态合作现代化等众多现代化内涵之中。

二、中国生态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及困境

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如,中国已经在法治层面上构建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完备法律体系,坚决打击危害自然环境安全的行为;中国已经成功将碳排放标准控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标准范围;中国成为世界上生态补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支出较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生态文明战略推进到社会实验层面的国家,并且通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中国是第一个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法律化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制定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强制性法律条文;中央生态环

境治理督察组通过两轮生态环境专项治理和“回头看”解决了困扰百姓民生环境改善的生态问题15万件。生态环境治理大大推动了中国生态现代化的进程,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表现如下:

(一) 生态治理参与理念难以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感性直觉

除去“现代化”内涵中的“西化”成分和“自我中心化”嫌疑,中国社会的“生态现代化”战略本质上是开放性的“群众参与战略”,也就是说没有普通民众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就没有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同样道理,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也不可能实现生态现代化。因为“纯粹技术上的,经济上的或者法律上的措施和手段,不可能带来实时性的改变”^[4]。只有解决肇始环境问题的“公众参与条件”,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工业化的困境。但是长期以来,受人口因素和参与渠道行政性的制约,中国生态现代化决策的参与主体仅仅局限在特殊的阶层和领域,广大人民群众大多游离于决策圈的“外围”。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决策主体始终徘徊于层出不穷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无法开展环境问题调研的专家智囊团体之间,最终形成了政府干预的“阿尔伯特陷阱”^[5]。在这样的境遇下,最了解自然环境污染问题根源的普通民众始终坚持“没有政府参与的环境综合治理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过场逻辑”,于是开放社会中的生态现代化决策就演变成政府、政党、企业和第三方中介组织相互博弈的“断裂性困局”。由于生态现代化治理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复杂系统,所以失却了基层参与主体的助力,必然引致生态治理的参与理念难以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感性直觉,进而引发持续的环境恶化和环境破坏行为。

(二) 生态文化的广泛宣传难以突破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底线

环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博弈过程。一方面社会治理阶层会通过各种“硬性”手段推进生态文化的过程性变迁,另一方面普罗大众又通过各种隐性规则表达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各种流媒体、泛媒体和融媒体充当了生态现代化宣传的主阵地,而较高成本的文化浸渍并没有产生基层群众利益妥协的感性直觉。从文化自觉的层面上看,在没有形成上下一体文化觉醒的时候,任何生态治理的

价值宣传都难以达成政府的生态污染综合整治目标。当一轮政策“流过”之后,新一轮的利益博弈又将已经“治理好”的自然环境“回归”到未治理之前的状态。可以这样说,中国目前生态现代化治理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利益的博弈困局上。只要正确引导了社会各阶层或者利益群体的“功利诉求”,将环境问题的治理与文化变迁的底线思维结合起来,只要给底层民众以合理的利益配置,那么生态现代化的目标就能早日实现。

(三) 环境治理滞后于民生改善必然酿生现实发展桎梏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环境治理的时间性逻辑始终存在着“先治理后发展”“先发展后治理”和“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等三种理念和学说。事实上这种争论的始作俑者是“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存在”的客观理性,而民生改善远远滞后于环境治理的实践进程必然导致贫困问题争论的喋喋不休。在某些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普通百姓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各种工矿企业的蜂拥而至导致“空心村”和“移民村”百姓生存紧致性危机。如果说生态现代化仅仅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关键性评价指标的话,那么“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争论”就只能沦为舆论的消遣而已。在没有重大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势下,在没有足够城市智慧帮助农民走向更加富裕的城市快车道的境遇下,和平安宁和休闲养老将成为百姓最美好的“梦想”。而日益加深的工业化进程就是“打破宁静的轰雷”,必然将民生问题推到历史的“前台”。改善民生福祉、逐步提高百姓生活、引导民生扶贫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集团利益嫁接生态问题”的“唯一选择”。

(四) 生态科技创新能力的落后严重影响中国的生态现代化进程

西方生态现代化进程表明,任何致力于市场经济改革和贸易体制创新的经济体必然面临特定阶段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环境问题的滋生并不是工业化的初衷,却是现代化的必然。关键的不是谈论减少污染的技术改革和发展战略问题,而是如何推动环境治理的技术问题。在我国工业治污技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境遇下,试图通过行政力量规模化治理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典型的“干预式生态行为”。显然在市场需求还没有达到“非治理不可”的条件下,各级各类企业生态治理的行为大多沦为

“借助治理决策套取国家资金”的亚生态循环境地。此时的生态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自然环境的高碳排放和社会生态舆论的污名化效用。尤其是在中国生态研发资金充足但是生态科技创新能力严重滞后于人民需求的环境下,生态污染治理的道路不仅荆棘丛生,而且步履维艰。根据《绿色中国》白皮书的调查数据,中国生态科技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08位,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伴随着国家生态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加,相信会出现环境污染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剪刀形”交叉的局面(环境污染指数下降伴随绿色发展指数上升的状态)。

三、推进我国生态现代化发展的策略和措施

实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必须牢牢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唯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实现十四五规划的伟大目标;只有建立常态化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一) 通过文化宣传推动生态现代化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人类修复生态环境的能力和反哺自然万物的能力,其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福利”是“速度优势”。也就是说建立在网络技术基础之上的舆论传播技术、融媒体交叉技术、广域媒体跨际传播技术、思政多媒体技术和物流信息传播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生态信息、生态战略、政府生态决策等的快速传递和边际流布,而且衍生了生态文化宣传的新领域和新部门,如自然资源部门、全国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调查组、各地生态资源保护组织、民间生态资源开发和监督组织、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热线、大学生态创新创业学院等。在“速度为王”的时代,推动国家生态现代化战略必须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要扩大生态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没有广大农民和普通工人的辛苦劳作就没有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同样道理,忽视了生态决策中的民众参与也就必然酿生政府行政的“寻租和续租”行为。要推动建立科学的生态决策参与机制,构建农民和工人参与决策的可操作性渠道,避免空谈“公民参与”。二是要以生态文化宣传助推政府环境决策中的民众参与。要建立村际自治组织互联网+服务站,构建农户家庭生态服务圈;要安装农户家庭环境治理广播网,每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环境治理节目;要对广大民众进行生态治理宣传,推动建立“移

动生产信息服务网”,为其提供生态就业服务和城市文明服务。三是要适当扩大知识分子的生态决策参与渠道。对于知识阶层的生态治理意见要进行归纳和梳理,避免空洞无物的生态治理论证,要汲取专家学者思想中的科学成分,制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生态决策。唯其如此,中国的生态现代化战略才能在21世纪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二) 以生态文明制度化推进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

制度是显性化的规则,而法治是硬性化的制度。在一个主要依靠伦理规范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中,道德的堕落和素养的失真将变得不可避免。即便个体以“组织或者群体规模”的方式来对抗社会整体,道德底线仍然是无法用价值教育来加以实现的,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是强势群体假借制度之名来僭越弱势群体利益和生命的市场功利活动,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收益逐渐泯灭在无休止的“寻租价格”争论之中。学者赵建军将制度贫困归结为“机制缺陷”,指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凡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定是制度的缺失或失效,要在制度建设和完善上下功夫,凡是反复出现、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就要从机制上找原因。”^[6]显然,生态文明的精神性诉求有且只有通过差异化的制度安排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具体讲,在全国人民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努力做到如下几点:一是要建立常态化的法治规范体系。包括探讨《环境保护法》的落地和修改问题,要把“生态破坏”的制度化惩罚机制落实到具体的生态环境污染案例之中,避免地方权力的“不作为”弹性和“地方法规弹性”。同时要配套《行政处罚法》《政务处分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可执行性的支撑体系。二是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化体系。要以“谁破坏谁补偿”的原则推动生态补偿法规体系的完善,杜绝自然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扯皮”现象和“转嫁责任”现象的发生。三是要规范生态污染治理监督机制。借鉴“自由观察员制度”,由具有高度学术权威和专业权威的生态学家组成“自由人团”,借此在日常生活中监督企业和政府的生态开发项目和环境治理措施,对于违反“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房地产项目、产业开发区项目、特色小镇建设项目、民族文化开发项目、休闲旅游健身项目、生态文化宣传项目和乡村别墅建设项目,坚决加以制止并“快速处理”。

(三) 在民生改善的基础上推进生态现代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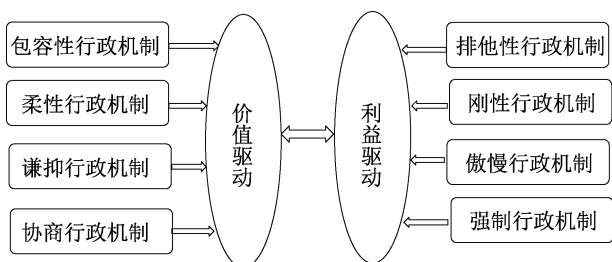
对于工业化进程中间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推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变迁不宜采取激进的“强制性变迁模式”,比如,在弱就业、强生态理念指引下推行的“准行政性城市化进程”模式,在弱化职业选择机会、强化政府绩效评价模式中推进的“农村拆迁工作”,在基层形象工程中出现的“规模化强占农田耕地”的逆民生行为,在“城中村”改造中酿生的“打砸抢”和“黑恶势力”乱象,在违背生态补偿基础上推行的“大化工战略、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和重化工业机械扩张战略”,在严重改变自然景观原貌的基础上推行的“生态旅游创收工程”等,都属于“逆生态化”民生行为,这些行为的发生普遍忽视了老百姓的基本民生诉求,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治理逻辑,必然酿生不可预知的民生灾难,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综合治理后遗症”。基于此,各社会治理群体必须从民生逐步改善的前提出发制订未来的发展规划和行动战略,切不可搞“全国一盘棋”式的宏大生态战略,要根据老少边远地区的生态民生变迁具体情况,制订差别化的生态现代化战略,否则生态治理进程将在“人民生活 and 实际收入显性分化”的境遇下艰难向前推进,其负外部性将超出治理者的显性预期。

(四) 以“行政文化生态化转型”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行政文化生态化转型的价值基础应以“人类的自然幸福”为理念支撑(如下图)。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政治的最终目的是幸福,行使权力的人是离幸福最近的物种。”^[7]也就是说,人类行政权力的存在价值在于其对人类健康祥和的维护,人的“类幸福”丧失了,一切国家战略、城市规划将毫无价值。在行政哲学视角下,“类幸福”镶嵌了“生态和谐”意蕴,它不是纯粹理念游戏,而是实在的民生福祉。基于此,现代政府部门必须以“人类的自然幸福”为理念支撑,改变行政运作模式、改善民生、提升群众生存质量,夯实行政文化的价值基础。一是大力提倡“包容性行政”,营造内生行政文化生态氛围。作为自然物种生存第一法则,包容性也是人类生活的第一自然规则,包容性行政心理如宽恕、理解、妥协、退让等的缺乏将直接导致专断的政治“生物链”,积极的行政作为将适得其反,变成“祸害民生”的消极作为,行政资源投入和行政行为运作效率呈负相关,行政话语都变得极为虚伪和无趣。“行政宽容”倡导各级各类行为主体无偏见应对不同事物,这是行政文化生态化转型的基本价值所在。二是大力提倡“柔性行政”。与“刚性行政”相对应,行政人员服务意

识平和、态度温柔、心态端正、解说得体是柔性行政强调的重点。作为对“刚性行政”强制性生态变迁的最大补充和扩展,柔性机制可最大化接近生物界“自在变迁”的生态链接原理,是行政变迁的文化方向性价值。基于此,可通过建立“行政自由人”褒奖制度,以第三方视角聘请离退休行政官员就现任职员的柔细行政行为做“虚拟自由人”省察,提高第三方的监督和评价水平;也可通过建立柔性服务客户评价档案,激励大胆创新的行政当事人。三是大力提倡“谦抑行政”。与“傲慢行政”相对,行政官员的办事态度、答疑解惑、执政情绪,是谦抑行政强调的核心,也是行政文化生态服务化转型的关键。高傲行政态度有违人类自身的生态和谐,而且迟滞他人和整个社会的生态演进。四是大力提倡“协商行政”。与“强制行政”相对应,协商行政强调纠纷的平等商议和均衡化解决,反对“关系行政”和“人情行政”,坚决取缔以“暴力行为”推进行政项目的做法,反对行政补偿过程中黑恶力量的介入、杜绝地产交易中的行政回扣现象、反对借“声讨公平”的恶意行政上访行为、避免行政官员隐瞒问题谎报政绩的行为,建立“为官不为”纠错临时档案,以警醒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干部和职员,通过行政诫勉制度潜在约束行政官员的不作为和行政性过失行为。协商文化氛围对于行政文化生态化转型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其意义不可小觑。



行政文化生态转型的价值基础

(五) 以绿色科技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生态现代化

国外最早提出绿色科技创新思想的学者杰尔·哈珀认为,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并不单纯是生产技术的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来看人类的文明进化史就是生态技术的变迁和发展史,离开了“环境尊重理念”和“自然敬畏意识”的产业科技进步本质上就是“毁灭自身手段的进步”。哈珀义正词严地指出:“技术创新是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但是并不代表一种技术狂的态度。”^[8]也就是说不要忌讳谈论“征服自然”的问题,也不要总是空谈保护自然的问题,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如何“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问题。开采自然资源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诉求,但是开采自

然资源必须符合自然环境本身的进化规律,该补偿的要尽快补偿,该修复的尽快修复。要制订生态修复技术长远计划和短期策略,不要竭泽而渔,空谈生态保护现代化。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大力提倡消费技术创新,借此推动生态消费观念的流布。在当下的中国,推动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绿色观念的发展,必须首先从消费技术上下手,因为任何生产规划和产业布局都是针对消费的。所以推动普通消费者购买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蔬菜、农产品、水产品、木材产品、休闲服装商品和日用消费品,是推动生态现代化的第一战略。没有绿色消费的指引和拉动,试图阻止高污染企业和高能耗产业进行关停并转是一件愚蠢的“拆墙”行为。二是要大力推动低碳技术的创新,推动低碳消费观念的传播。所谓“低碳”消费悖论主要是指工业化主导产业的高污染和高产能难以驾驭污染性碳的“排放和控制”的问题。比如离开了碳元素的供给,某些产业的发展就会停滞,而增加了碳元素的供给,某些产业的发展就会产生环境污染等问题。现实中必须建立碳元素科学监督机制,定期对国有企业碳排放进行抽查,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要率先垂范,引领中小企业减少碳排放量;要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如可燃冰能源、沼气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地热能等;要建设生态高铁,避免高铁建设对原生资源的破坏;要建设生态高速公路,避免高速公路碳排放对周边农业生态资源的破坏。三是要大力推动农产品绿色技术的创新,推动绿色生产观念的代际传承。民以农为本,人以农为生。农产品绿色技术包括优良品种繁育技术、杂交水稻技术、果木嫁接技术、绿色运输技术、农产品生态加工技术、化肥使用控制和检测技术、农药喷洒技术、农药残留物封存技术、农村土地保养技术、农产品加工和储运技术,等等,这些环节都是可以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因此,各级各类社会主体都应该齐心协力,以生态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马丁·耶内克. 作为生态现代化和机构政策的预防性环境政策[J]. 自然(德文版), 1982(2): 11-12.
- [2] 费·卡普拉. 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M]. 冯禹,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45-46.
- [3] 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90.
- [4] 米都斯. 增长的极限: 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R]. 李宝恒,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49.
- [5] WIER. A. ALBERT. Sociology, Ecology, Modernity: Ecology

- Modernization as a Theory of Social Change[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992:36.
- [6] 赵建军. 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梦——生态文明开启新时代[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15.
- [7] 亚里士多德. 家政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11.
- [8] HUBER. J. Pioneer Countries and Global Diffusion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Thes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8(3):361.
- [责任编辑 李瑞萍]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Background,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ZHANG Yaru

(Campus Newspaper Editorial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Sha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Shaanxi Academy of Governance], Xi'an, Shaanxi 71006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speed up the governanc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building “harmonious symbiosis moderniz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ina has mentioned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several times at multiple levels. Overall, the prominenc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challen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re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China to promot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ect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issu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five in one” strategic layout. Only by deeply integ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o all aspects of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gradually expanding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publicity in ecological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a normaliz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gr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we truly realize the grand strategic goal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